

三松堂

自序



冯友兰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建树的哲学家，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。他一生虽从未脱离校园，却一直处在社会的中心地带，在他的身上印刻着时代的种种波诡云谲。冯先生著这部回忆录时，已是耄耋老年，一个世纪的风云从心头渐起，往事千端如在目前，“忆往事，述旧闻，怀故人，望来者”。所以，这不是一部书的自序，甚至也不是冯先生全部著作的总序，而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大哲在大转型时代的自叙，是一个时代的纪录与反思。本书自问世以来，深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好评。

冯友兰

著

忆往事，
述旧闻
怀故人，
望来者

东方出版中心

海外借

三松堂自序

冯友兰

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松堂自序/冯友兰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6. 10

ISBN 978 - 7 - 5473 - 1015 - 1

I. ①三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冯友兰(1895—1990)
—回忆录 IV. ①K825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19178 号

三松堂自序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51 千字

印 张: 12.125 插页 2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73 - 1015 - 1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(021)52069798

自序

古之作者，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，每别作一篇，述先世，叙经历，发凡例，明指意，附于书尾，如《史记》之《太史公自序》，《汉书》之《叙传》，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，皆其例也。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，知其人，论其世，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，得失之所由。传统体例，有足多者。

本书所及之时代，起自 19 世纪 90 年代，迄于 20 世纪 80 年代，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，其波澜之壮阔，变化之奇诡，为前史所未有。书于其间，忆往思，述旧闻，怀古人，望来者。都凡四部分：曰“社会”，志环境也；曰“哲学”，明专业也；曰“大学”，论教育也；曰“展望”，申信心也。长短不同，旧日小说家所谓“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”也。揆之旧例，名曰“自序”。非一书之序，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。世之知人论世、知我罪我者，以观览焉。

“三松堂”者，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，余家寓此凡

2 三松堂自序

三十年矣。十年动乱殆将逐出，幸而得免。庭中有三松，抚而盘桓，较渊明犹多其二焉。余女宗璞，随寓此舍，尝名之曰“风庐”，谓余曰：已名之为风庐矣，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？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，皆所以寄意耳，或以松，或以风，各寄所寄可也。宗璞然之。

书中所记，有历历在目、宛如昨日者，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。余亦届耄耋，耳目丧其聪明，为书几不成字。除四、五、六章外，皆余所口述，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，于书之完成，其功宏矣，书此志谢。

冯友兰

1981年11月

目 录

自序	1
----------	---

一、社 会

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	3
第二章 民国时期	33
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	133

二、哲 学

第四章 20 年代	203
第五章 30 年代	219
第六章 40 年代	251
第七章 50 年代及以后	285

三、大 学

第八章 北京大学 321

第九章 清华大学 338

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355

四、展 望

第十一章 明志 371

一、社 会

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

1895年12月4日(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)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。祖父名玉文,字圣征,有三个儿子。我的父亲行二,名台异,字树侯。伯父名云异,字鹤亭。叔父名汉异,字爽亭。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(1898年)科进士。伯父、叔父都是秀才。在祖父教育下,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,进入了“耕读传家”的行列。

听家里传说,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,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。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,本来是可以录取的,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,有人劝祖父去疏通,祖父不肯,就没有录取。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,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。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。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,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,传下来的几十首诗,编为《梅村诗稿》。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。当时邻县的

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，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：

身处人间世，
心怀太古春。
风流伊上叟，
击壤作尧民。

是以邵雍的《击壤集》来相比的。

我的伯父也能作诗，把他自己的诗编为《知非斋诗集》。父亲也能作诗，有《复斋诗集》。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，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，留下的诗，家里的人编为《梅花窗诗草》。

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。我有一个偏见，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。宋代的严羽说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（《沧浪诗话·诗辨·五》）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。有些人学问很大，可以下笔千言，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，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，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，但就是不是诗。

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，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。在清朝末年，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，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。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。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，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，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。

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，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，家里请一个先生，教这些孩子读书。女孩子七岁以后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，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学生有七八个人，都是我

的堂兄弟和表兄弟。我们先读《三字经》，再读《论语》，接着读《孟子》，最后读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。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，才算读完，叫做“包本”。有些地方读“四书”不仅要背正文，还要背朱（熹）注，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。

当时一般的私塾，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、试帖诗之用的书，如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之类，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，叫做《地球韵言》，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。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“新学”。我们家的那个私塾，也算是新旧兼备了。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，于“四书”读完之后，就读经书。首先读《诗经》，因为它是韵文，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。我于读完《诗经》之后，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。

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，以知县任用，分发到省里去。照清朝的传统办法，分发到哪一省，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。在清朝末年，这个朝廷公开卖官，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，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，当时称为“捐官”。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，在吏部分发的时候，也可以出一笔钱，不由抽签，而由自家指定，愿意到哪一省，就到哪一省去。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，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，称为“指省”。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，不愿到边远地方去，用“指省”的办法，分发到湖北。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，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，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，一直通往汉口。我们家乡这一带，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，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。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，都是通过唐河、汉江，到汉口的，所以汉口、武昌这些地名，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

很熟悉的。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、武昌去的，我现在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，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，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，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。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，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。所谓“候补”，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，去补那个缺。补上了缺，称为“得缺”。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，都是科举出身的，后来因为有捐官，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，所以“得缺”越来越困难。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，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，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，称为“遇缺先”。没有“遇缺先”特权的人，就成了“遇缺后”了。所以《官场现形记》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。

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，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。那时候，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，他办了一些洋务，一些新政，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，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，叫“方言学堂”。学校的监督（相当于后来的校长）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。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（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）。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，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，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。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，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，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，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、妹妹淑兰（沅君）三人上武昌安家。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。因为在地主阶级中，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。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，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，可是路怎么走，经过了很

长时间的讨论。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,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,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。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。可是有人说不行,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,起码坐二等,三等就男女混杂,不成体统。坐船倒可以,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,跟别人不混杂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。商量来,商量去,终于决定坐船。我有一个姑母,家住唐河河岸附近,她有个佃户有船,坐这个佃户的船,最可靠了,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,包他的船到汉口。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,先到她家里,再到河边去上船。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,在船舱里只能坐着,不能站起来。一上船,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,特别是说话,有些字像“翻”字、“滚”字都不能说。上船后,走了两三天到襄樊。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,船家又来告诉,说明天进汉江,这是大河,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,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,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。进了汉江,一路顺利,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。船先停在汉口,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。父亲来了,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,不过要过长江,若是下了这条船,再上渡船,又下渡船,太麻烦,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。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,吓得惶恐万状,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。经过说服,他勉强答应了,但是嘱咐大家,把窗子都关上,一句话都不要说。渡过长江,搬到租的房子里边。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,一到这房子里边,都不舒服极了。

在武昌租的房子,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,里边只有一个天井。说它是天井,倒也名副其实,站在院子里看天,真像《庄子》所说的井底之蛙,坐井观天。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,院子没有

内外之分,很不成体统,不像个样子。后来搬到黄土坡,天井比较大一点,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,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。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,习以为常了。

当时最大的问题,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。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。如果我要再大几岁,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。父亲很重视学外文。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,除了管吃管住外,每月还发几两银子,作为零用。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,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。可是我岁数不到,没有办法。附近也有小学,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,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。因为父亲相信,在学新知识以前,必须先把中文学好。他认为,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,学什么都不行。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,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,言语不通,他们很不放心。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,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。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,认识一些字,有些字只能读其音,不能解其义。不过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,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,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,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。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母亲监督着我们读,读熟了向她背,能背就行。遇见母亲不认得、念不出的字,就记下来,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。用这样的办法对付,我读完了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,还开始读《左传》。

照他们的计划,父亲还要经常出题,叫我们作文章。实际上只作过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游洪山记》。住的地方黄土坡,离洪山不很远。我们家的厨师,经常带我们到洪山去玩。有一次在洪山碰见一个洋人,带着一条洋狗,那条洋狗见着生人就乱咬,我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,并没有大伤。我们的厨师带我去找那个洋人,

那个洋人拿出了几毛钱,我们不要,我们说,我们并不是为这几毛钱,只是要警告你,你的狗不能乱咬人。回家以后,我把这些情况说了,父亲大加赞赏,说这种态度很好。

我和景兰各写了一篇《游洪山记》,无非是描写了一些风景之类。父亲一看说都不行,不值一看,他说写这类文章,要有寄托,要能即景生情,即物见志。他也写了一篇,作为示范。原来太平军围攻武昌的时候,湘军将领罗泽南率领一支湘军来解围,他冲破了重围,已经冲到城墙跟前,喊叫城内清兵开城门出来接应。可是城内清兵拒不开城门,既不敢出来接应,也不敢让他们进去。太平军又合围了,就在洪山下边打了一仗,湘军败了,罗泽南也阵亡了。父亲作的游记,就借着这件事情发挥,说人应该有大志,做大事,不能仅只游山玩景,白费了有用的岁月,如果如此,那就要为山灵所笑。

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,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。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。遇见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,他也要我们做。当时武昌的学校,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。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,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,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。下身长裤,也是浅蓝色。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。还教我们唱《学堂歌》。《学堂歌》是张之洞作的,当时大、中、小学堂都唱。歌词开头说:

天地泰,日月光,听我唱歌赞学堂。

圣天子,图自强,除却兴学别无方。

下边分说当时所谓各种新学的要点和意义,有些现在看着是很平

凡甚至是错误的。有一段讲地理,说:

中国圆,日本长,同在东亚地球上。

讲历史的有这两句:

论乡贤,屈原尚,忠言力谏楚怀王。

后来我上大学以后,读到《荀子·成相篇》,才知道他这歌用的是《成相》的调子。他大概以为《成相》是楚国的调子。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,其实也无所谓唱,因为本来没有谱子,只要大声念,再把腔拉长一点,就算是唱了。

父亲和母亲订的这个教育方案,对付了几个月,又出问题了。父亲得了一个兼差,被派跟着粤汉铁路的勘测队去勘测粤汉铁路的路线,名义是“弹压委员”,实际的职务大概是替勘测队办一些同地方上交涉的事。这个队一直勘测到湖北跟湖南交界的地方,就回武昌了。回来不久,又被派当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,跟着勘测队勘测川汉铁路的路线。这两条铁路都是张之洞新政计划的一部分,可是从我父亲回来以后,就没有听说下文了。粤汉铁路一直到抗战开始才刚刚修成。川汉铁路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线。一直到最近几年才修成由汉口经过襄樊到重庆的铁路,人们现在可以从汉口坐火车直达重庆了,这也就是川汉铁路了。

这都是以后的事,我父亲当时参加了这两条铁路线的勘测工作,写了几大本日志。他当时所勘测的川汉铁路路线也是经襄樊的,他在日志中写有一些按语。其中有一段是讨论在襄阳设火车